

# 绪论

---

作为本书的绪论，先阐述三个想法，再概述一下本书内容。

## 0.1 关于翻译理论和实践

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可分出三个范畴：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的工作基础是双语和双文化能力、百科知识和语际转换技能，工作方式是源文诱发的译文写作，服务对象是译文读者，目的是促成和实现语际交流。翻译教学的工作基础是翻译实践能力加上教学能力，工作方式是包括讲解、示范和批改学生练习在内的教学活动，服务对象是委托人、学生或学员，目的是培养能独立完成跨文化、语言交际的翻译人才。翻译研究的工作基础是有关语言、文学、文化和社会的理论知识以及对翻译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工作方式是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描写和阐释，服务对象是翻译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论爱好者和部分实践者，目的是加深人类对语际交流的认识，揭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规律和实质。

与这三个范畴相应的人员即译者、教师和研究者三种角色。这三类角色应当也必须相互沟通。研究者研究的是实践者的具体工作过程和成果，教师讲授的内容也同样基于他人或自己的实践，没有翻译实践，翻译研究无从谈起，教学也会沦为空谈。就目前的情况看，许多理论研究

人员也翻译过不少作品，许多翻译实践人员也不时写文章或著作探讨翻译问题。翻译教学人员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实践经验，或者一定程度的理论修养。从社会需求数量来看，实践人员居首位，教师和研究者依次次之。在双语和双文化方面有才能的人应该去从事各类翻译实践活动(不仅是文学翻译)，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当这些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可以从事译员培训或理论研究。教学和研究者绝不能脱离实践，口译尤其如此。至少就目前而言，很难想象一个从不或几乎不动笔、动口翻译的翻译教员或研究者能为翻译事业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理论研究者的角色，或者说翻译理论是重要的，但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应太多；实践者、教师和研究者应该有一个恰当的比例。

Hatim (2001) 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说：“翻译研究力推这样的主张：研究不仅是针对或关于翻译实践者的，还是实践者可以做的。”<sup>1</sup> 他呼吁打破实践与理论的绝对边界，提倡所谓自省考辨 (self-reflective enquiry)，即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对当前我国翻译研究的现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但也应该预见到，随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随着有关文章著述的大量涌现，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分工势必会越来越明确。有专攻理论者，也有专事实践者。研究人员会无暇从事实践，实践人员也无意去读那么多文章和著述。“实践和理论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实践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家，理论家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实践家，实践家可以成为理论家，但前提是他必须花费与他的实践几乎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理论。反之亦然” (王东风，2002)。理论研究人员不应将实践人员贬为“翻译匠”，工匠干活其实自有其原则和方略，塑得一篇篇独具匠心的好译文，是很了不起的。实践人员也无须将理论斥为空谈，他们其实是以你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发现的东西可能对你有帮助，你也可以用自己丰富的实践为他们提供材料，对他们的看法进行批

---

1 Translation studies is seeking to promote the stance that research is not only something done *to* or *on* practitioners, but is also something done *by* practitioners.

评。应该提倡理论研究者从事些翻译实践,也应提倡实践者拨冗读一点、写一点研究文章,在翻译研究发展的目前阶段尤其应这样做。但这两类人毕竟是在两个范畴内从事着不同性质的活动的。理论研究人员翻译点东西,可能是为亲自体验一下,验证理论问题,他们并不以卷帙浩繁的译著为己任;翻译实践者也会看点文章,写点文章,但由于他们无暇研读大量文献,他们的文章并不充分引证他人,无长长的参考书目,更像是个人经验的总结和体会。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文章或著作,大致就可分为这么两类:理论著述和经验著述,而这两类文章和著作都是有价值的。

研究者和实践者是可以沟通的,但他们是两种角色,研究层面和实践层面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Toury (1995) 在谈论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关系时这样说:“翻译实践当然是翻译研究各个分支的目标层次,但却不是诸分支的‘实际应用’。这正如说话……并非语言学的实际应用一样;但语言教学或言语矫治倒是语言学的具体应用。”同样,本书建立翻译语境描写理论框架的直接目的,只是揭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性质和规律,从而深化对语篇生成和使用机制的认识。它和翻译实践和教学不是一回事,但会对翻译教学和翻译批评产生影响。“理论将不仅以抽象形式存在,它将是动态的,将涉及对翻译实践中具体问题的探索。理论和实践将互相滋养”<sup>2</sup> (Bassnett, 1998)。

## 0.2 关于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

被移植的理论在翻译研究这个受体学科的新环境中能否存活并发展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被移植的理论至少要经历下述两种适应、演变和确立的过程。首先,要经受更多的翻译语料的验证,要经受

---

2 Theory was not to exist in the abstract; it was to be dynamic and involved a study of the specifics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ory and practice were to supply mutual nourishment.

不同翻译研究人员从各种不同视角的审视；其次，要经历与其他植入理论——尤其是从不同供体学科移植来的理论——的互动、合作和体系化的过程。翻译研究的发展表明，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学科很多，其中不乏有移植价值的理论和概念。这些理论植入翻译研究领域后绝不能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而必须经历一个相互影响、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供体理论的身份渐渐淡化，翻译学科的内任体系渐渐显露成型。

然而，翻译研究与供体学科的亲缘关系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如何处理好这种亲缘关系对翻译学科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供体学科的任何新发展动向都可能对翻译研究产生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营养。而翻译学科选定某个理论进行移植，实际上也就是对供体学科的某一理论模式或概念的一次实际应用和验证，也会对供体学科提出某些新问题，对其发展有所促进，并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翻译研究者移植了某个学科的理论，而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对翻译领域的某些问题产生了兴趣，想用自己的理论探索一下。前者是跨学科移植行为，而后者则是对现有理论的应用。应允许这两种研究模式同时存在，并鼓励和提倡它们相互交流、交锋。这将对供体学科和受体学科产生双赢的促进作用。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为描写和解释同一类翻译问题而引进来自不同供体理论体系的一个以上的模式或概念的植入重叠现象。比如，语用学中的预设（**presupposition**）、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功能语法中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均可用以描写特定源语文化成分的翻译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主导理论框架从两个方面加以整合：第一，将植入的理论和概念纳入翻译研究领域的适当层次；第二，将植入的理论和概念系统化（必要时可加以变通），使之形成一个子系统。比如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概念，文化语境和文化缺省是否可成为上下位术语，用以描写文化成分的处理；而预设概念则可用于探讨文化翻译的认知层面。

我们要问的是语言学理论或其他有关理论能为翻译领域提供或做些什么，而不是翻译领域能为某个理论做些什么。文化研究不是翻译研究，语言学不是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哲学研究也都不是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应该也必须有自己的疆界，这个疆界要通过它自身的发展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和互动逐步界定出来。

翻译研究应该发展成为一个自立的体系。翻译研究的文化学途径的研究原则，值得语言学途径借鉴。Lefevere (1978) 在界定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目标时提到一个至今仍需加以关注的观点，即：翻译研究学派要摆脱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纷争，就必须转变看问题的视角，不是将已有文学或语言学理论用于翻译，而是先观察翻译中的特定问题，而后用文学或语言学理论解决之 (Gentzler, 1993)。这也就是 Bassnett (1998) 所说的“对将翻译研究严格纳入文学或语言学领域的拒绝” (...a refusal to locate translation studies either strictly within literary studies or in linguistics.)。翻译研究学派对现代译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关乎移植相关学科理论时的立足点问题。翻译学者应该力戒任何先决的、永恒不变的规范，而必须不断地自我评价和发展。“[翻译研究]所观察的对象，并不是真实世界中等待我们进行科学阐释的某个固定的东西，也不是更高层次上以神秘方式揭示出来的超验真理。相反，翻译研究的目的就是翻译本身，是受制于理论操作和主流艺术规范的译介行为”<sup>3</sup> (Gentzler, 1993)。同理，翻译的语言学途径也必须牢牢地基于跨文化、语言交际的实际，不能将翻译实践硬性套入先验的理论框架，翻译研究是一个不断自我演变、自我完善、自成一统的过程。

翻译研究要成为一个自立的学科体系，要善于对翻译研究史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反思，适时总结经验，修订研究日程和发展目标。应该

---

3 ...the object being investigated is not something fixed in the real world to be scientifically investigated, nor is it the object of higher, transcendental truth to be revealed in a mystical way. Rather, the objects of study are the translations themselves, which are by definition mediations subject to theoretical manipulation and prevailing artistic norms...

进一步确立像科学那样的研究分支——翻译研究史或关于翻译研究的研究。翻译学是具体的研究工作，而翻译研究史则是对具体工作的反思、总结和规划，可以使研究者更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在整个翻译研究中的位置、和其他研究分支的关系，以及今后可能的走向。

## 0.3 翻译研究的学科间性

### 0.3.1 翻译研究的学科间性<sup>4</sup>

自从 Toury (1995) 将 Holmes (1988) 对翻译研究领域的整体设想化为一张图解以来，它一直是现代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最重要的蓝图，尽管有的学者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补充。比如 Pym (1998) 就认为这张图没给翻译史研究留下一席之地。随着这门学科的蓬勃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诸多研究范式的出现，学术界对这张图的描写和涵盖力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也出现了对翻译研究领域分裂趋势 (fragmentation) 的担忧。一个新的认识是：应采取学科间性 (interdisciplinarity) 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作为一个自立学科的发展和其涵盖范畴 (Duarte, 2006)。

McCarty (1999) 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人文资讯学 (humanities computing) 的学科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他对间性学科 (interdiscipline) 做出了如下的描写：

---

4 其实对翻译研究的学科间性的关注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尽管当时并未提到目前的理论高度。McFarlane 早在 1953 年便提到，语言学家只在自家的领域内研究翻译是不行的，“要想深入探索，就必须涉及相邻的领域，依赖它们的指导和启示”。(…a thorough exploration will compel him to make repeated approaches through the territories of his neighbours, and he will rely on their guidance and advice.) 我国的吕叔湘 1951 年也早就有“杂学”论，不过那主要是指实践层面而言的。

它是存在于固有学科领域缝隙间的一个实体，涉及其中某些、很多或所有学科。它是游走于定居民族中的腓尼基商人。<sup>5</sup>

关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他提出：

我分辨出两种关系——首要关系和次要关系，依据是我们是把另一学科领域的途径和方法融入我们的领域，抑或只是为其服务以及从中汲取可用于其他领域的技术。<sup>6</sup>

虽然 McCarty 所论针对的是人文资讯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但他对学科间性的认识无疑具有普遍意义。翻译研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也处于十分相似的境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翻译研究确实一直游走于众多传统学科之间，学科间性是它格外突出的本质属性。我们也看到，翻译研究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动态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和语言学有关分支发生学科间性关系，而 90 年代以来则有众多的诸如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和翻译研究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间性互动。从研究人员个体的角度看，不同学者也会选择向不同的学科寻求理论支持。

其次，游走于相关学科间的翻译学者们必须明确自己的准确身份。我们是间性学科研究者（interdisciplinary），而不是单学科研究者（disciplinary），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便失去了学科身份，或隶属于其他某个学科，比如变成了比较文学学者或后殖民主义学者。我们的确切身份仍然是翻译研究者，都是“腓尼基商人”，属于腓尼基。这个身份就意味着，你走出翻译研究的传统领域向某个相关学科寻求理论工具，

---

5 It is an entity that exists in the interstices of the existing fields, dealing with some, many or all of them. It is the Phoenician trader among the settled nations.

6 I have mad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lationships, depending on whether we incorporat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a field into our own or just serve its interests and draw from it whatever common techniques might be of use elsewhere.



还必须回到翻译研究领域这个腓尼基国度，与其他腓尼基商人同胞分享商旅成果。翻译研究者的学科间性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必须经历一个同行间的分享、筛选、甄别和融合的过程。

最后，学科间性顾名思义就是双向的。翻译学者既索取也给予，我们也要承担向相关学科“兜售”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对他们提出批评的任务。这样翻译研究才能在学科间性互动中真正获益，并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 0.3.2 学科间性视阈下的现代翻译研究“示意图”

以学科间性审视现代翻译研究始于 20 世纪中期，主要是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我们不难得出一幅新的示意图，如图 0.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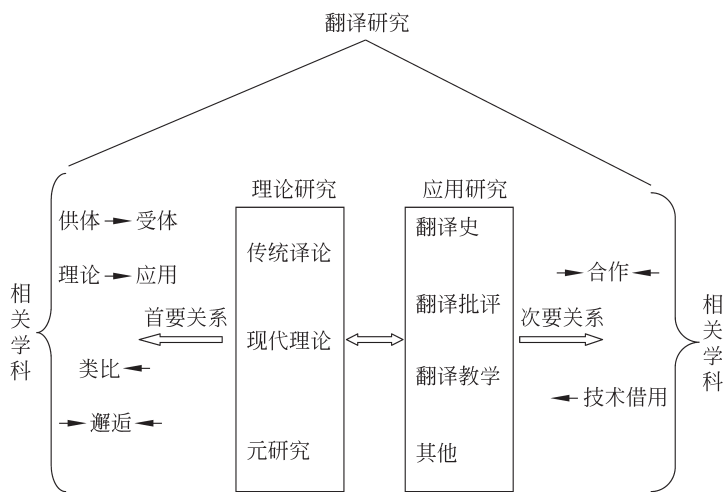


图 0.1 学科间性视阈下的现代翻译研究

图中翻译研究仍旧分为理论和应用两大分支，均存在于与相关学科间性关系中。我们采用 McCarty 的术语，理论研究分支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被称为首要关系，应用研究和相关学科的关系则称为次要关系。首要关系包括借鉴或植入相关学科的理论模式或研究方法，或与相关学科产生互动，甚至对其提出某种理论挑战；次要关系指借鉴其他学科的技术



或分析工具，或与其进行合作。下面分别简述两个分支的研究范畴，以及它们体现出的学科间性。

### 0.3.3 理论研究诸范畴

#### 0.3.3.1 传统译论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翻译传统。这既包括翻译实践，也包括产生于翻译实践的对话际信息传译的原则和方法的阐述。仅从 Mona Baker (1998) 所编纂的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的“Part II History and Tradition”中已可窥见各种文化中翻译传统的丰厚和多样。这些传统连同它们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构成一幅幅人类文化演变和发展的长卷，现代翻译研究正是在这种传统的积淀之上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与科学技术发展史有所不同，现代的翻译实践规模虽然比过去大，翻译媒介也有极大进步，但翻译质量却未必有多少提高，而所谓现代翻译理论也未必比我们的先人的只言片语更高明。所不同的是，现代翻译研究呈现了明显的体系性和学科意识，而传统的针对翻译问题的论述多取散在的、箴言式的表述方式。为了有所区分，不妨将其称为“译论”(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以对应现在流行的对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翻译研究的称谓——“翻译研究”或现代理论。

对于传统译论的研究，张佩瑶(2008)做过详细论述。我们的看法是：首先，研究传统必须进入历史，即把有关译论依照历史的“真实”语境化。将译论置于史实，而非眼下的现实中。因为古人或前辈的译论作为一种学术话语，无不来自当时特定的翻译实践，无不存在于当时的学术话语网络之中，脱离了彼时彼地的语境，它们便会面临化解为无数解读可能性的虚无状态。其次，译论是先人的经验之谈，都是个人经验和他人经验与机构力量(institutional power)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把对译论的重读和论者个人的经历结合起来，将译论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将译论者和社会权势的关系考虑进去。最后，传统译论可以是翻译史的一部分，也可以用现代的视角加以诠释，但更重要的是它

应该起到衍生现代翻译理论的作用，对传统译论的研究目的，是沿着历史的轨迹推演和发展出其当代的理论模式，使译论演变为理论，融入当代翻译研究之中。19 世纪初叶 Schleiermacher 对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关系的论述，就被 Venuti 演变成当代翻译研究中的异化和归化翻译等概念，使概念得以发展，使历史得以延续，使现代翻译研究得到了历史的滋养。这也应该是我国传统译论研究的目的所在。传统译论应该与现代翻译研究组成一个连续体，从而体现出一种文化传统中翻译理念的连贯传承轨迹。传统译论和现代翻译研究不应是断裂的。

对传统的发掘非常需要相关的历史知识，其学科间性体现在对历史学、宗教史、哲学史、儒学、道学、佛学中有关史实的运用及有关理论和思想的借鉴和移植上。而当我们把传统译论置于现代语境中试图加以发展的时候，哲学、语言学、认知研究、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都不乏可借鉴的理论和概念。

### 0.3.3.2 现代理论

现代理论指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所确立或初步确立的理论模式，是针对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现象和课题，借鉴或植入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而逐步确立起来的。Nida 依据《圣经》翻译实践，借鉴语言学理论和交际理论提出了逆转换翻译模式和动态对等理论；Hatim 和 Mason 按照功能语法的语言模式，确立了翻译的语篇 - 语境分析模式；德国学者借鉴交际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和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结合非文学语篇翻译实践建立了以目的论为核心的功能派翻译理论；法国学者从口译实践和教学出发，沿着认知心理学的思路，创建了释义理论；而以色列学者 Even-Zohar 移植了 20 世纪 2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的理念提出了翻译的多元系统理论；而所谓“文化转向”也是以文学翻译为主要观察对象，在和文化研究的互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看出，现代翻译研究中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模式，无不和相关理论发生学科间性互动关系。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现代翻译学的发展经历的基本是一条跨学科移植的路径（李运兴，1999）。

上一段我们提到了几个学者的国别，这自然引出了国别理论问题：